

从年号讖看东晋至隋政治 文化的一个侧面*

吕宗力

【摘要】始于西汉武帝的年号纪年，系其后两千多年中国历代皇朝沿用的主流纪年模式，影响波及东亚、东南亚汉字文化圈。年号不仅用作纪年，而且是强化统治正当性、寄托统治者美好愿望、祈求“天意”支持、激励朝野民众的政治符号。而视年号为加密的讖言，将精挑细选的吉祥美妙字词“破译”为负面甚至险恶的天启信息，则是自魏晋起常见的操作。此类“破译”各具深意，是值得研究却较少受到关注的传统政治文化现象。

【关键词】年号 讖纬 政治文化 魏晋南北朝 隋

【作者简介】吕宗力，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道扬书院院长、人文社科学院兼职教授，南京大学特任教授。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 - 1125 (2024) 11 - 0005 - 13

中国古代纪年曾采用岁次纪年、太岁纪年、日辰（干支）纪年和王公（帝王）年次纪年等方法。^① 西汉武帝始创的年号纪年方法，^② 在其后两千多年中为中国历代皇朝沿用，影响波及日本、朝鲜、越南等汉字文化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纬书文献的综合整理与研究”（20&ZD226）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何幼琦：《干支纪年史的探讨》，《殷都学刊》1992年第4期，第24~29页。

② 关于汉武帝于何时创建年号纪年，学界说法不一（参见郭培培：《汉武帝年号与封禅关系探析》，《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28~30页）。目前较主流的两种意见为元鼎四年说和太初元年说，参见辛德勇：《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101页。

圈国家。

“朝野上下俱便于记载，实为万世不易之良法”，^① 应该是年号纪年为历代皇朝沿用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帝王们特别青睐这一纪年方法，其实有更深层的政治文化考虑。汉武帝第五元第三年（114年，即后来追建的元鼎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② 说明采用年号纪年的初衷正是借天赐祥瑞持续强化帝王的统治权威与正当性。“年号既然具有如此重大而又如此神圣的象征意义，皇帝在选择年号时，自然会在名称中寄寓自己的政治期望，或昭示某种政治信号。”^③ 因此，历代帝王在改元及确定年号时，必选择适合当时政治文化语境的吉祥、美好、神圣之字词，以趋利避害。^④ 芮沃寿（Arthur F. Wright）等西方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指出，年号是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重要资源，年号选词偏好与相应历史时期的思想潮流存在互动关系，其偏好的演变反映了在不同历史语境中政治思潮的变迁趋势。^⑤ 芮玛丽（Mary C. Wright）则认为年号的选词各具深意，辨识每一个年号隐含的信息极具挑战性。^⑥ 笔者在美国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天命与命运——中古中国的谶言与政治》（*Heaven's Mandate and Man's Destin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The Role of Prophecy in Politics*, 1995）时，受上述学者启发，在第四章“语言魔法与天启信息”（*Word Magic and Revelation*）中，专门讨论了魏晋南北朝至隋年号中的谶语。^⑦ 本文在该讨论基础上略作发挥。

①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2《武帝年号系元狩以后追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8页。

② 《史记》卷28《封禅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89页。

③ 辛德勇：《年号背后的玄机与深意》，《人民论坛》2021年第27期，第109页。

④ 《册府元龟》称年号之用“或章述德美，昭著祥异，或弥灾厌胜，计功称伐”。见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15《帝王部·年号》，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57页。

⑤ 参见 Arthur F. Wright and Edward Fagan, *Era Names and Zeitgeist: A Review Discussion*, *Asiatische Studien*, Vol. 5 (3-4), 1951, pp. 113-121; Edward H. Schafer, *Chinese Reign-names-Words or Nonsense Syllables?*, *Wen-ti*, No. 3, 1952, pp. 33-40.

⑥ 参见 Mary C. Wright, *What's in a Reign Name: The Uses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18 (1), 1958, p. 103.

⑦ 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在修订后作为专著出版，参见 Zongli Lu, *Power of the Words: Chen Prophecy in Chinese Politics, AD 265-518*, Oxford, Bern, Berlin, Bruxelles, Frankfurt/M., New York, Wien: Peter Lang AG, 2003, pp. 118-126。此外，还可参见吕宗力：《谶纬与两晋南朝的政治与社会》，《中华国学研究》创刊号，2008年10月，第67~77页。

一、东晋至隋的年号谶

(一) “昌”与“二日”

史籍明确记载的年号谶始见于东晋。“昌”，兴盛、光明、美好之意，常入选年号用字。东晋元帝司马睿采用的第三个年号就是“永昌”。然而，永昌元年（322年）正是元帝对朝局失去控制之时。大将军、荆州牧王敦以诛刘隗为名，在武昌起兵，直扑建康，拥兵石头城，王导态度暧昧，天子号令不出宫门。元帝忧愤成疾，于当年闰十一月己丑日病逝。《南齐书·海陵王纪》史臣曰：“郭璞称永昌之名，有二日之象，而隆昌之号亦同焉。案汉中平六年，献帝即位，便改元为光熹，张让、段珪诛后，改元为昭宁，董卓辅政，改元为永汉，一岁四号也。晋惠帝太安二年，长沙王义事败，成都王颖改元为永安，颖自邺夺，河间王颺复改元为永兴，一岁三号也。隆昌、延兴、建武，亦三改年号。故知丧乱之轨迹，虽千载而必同矣。”^①天无二日，国无二君，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共识。郭璞将“昌”拆解为“二日”，似是批评永昌年间王、马对峙的政治乱局。

(二) “建元”与“丘山倾”

晋成帝司马衍五岁登基，在位十七年，王导和帝舅庾亮、庾冰先后把持朝政。咸康八年（342年）六月，成帝驾崩。在成帝临终前，中书令庾冰“自以舅氏当朝，权侔人主，恐异世之后，戚属将疏，乃言国有强敌，宜立长君”，^②说服成帝立其弟司马岳为嗣，是为康帝。次年，庾冰为康帝改元选择年号，“而晋初已有，改作，又如之，乃为建元”。^③“建元”即西汉武帝在始创年号纪年时追记的第一个年号。“建”，创也；“元”，始也。庾氏兄弟有心收复中原，开创新局，也许借此年号明志。然而，不久就有人提醒庾冰：你选这一年号，难道忘了当年郭璞的谶言？原来在庾冰之弟庾翼幼时，庾家曾请郭璞为庾氏兄弟卜筮前程，卦成，郭璞作谶语云：“建元之末丘山倾，长顺之初子凋零。”如今康帝名“岳”，又改元“建元”，岂非应了

^① 《南齐书》卷5《海陵王纪》，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80~81页。《南史》卷5《齐本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61页）的史论略同。据学者考订，晋惠帝改元为“永安”实在太安三年，该年一岁而四改号。参见丁福林：《南齐书校议》，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8页。

^② 《晋书》卷7《康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7页。

^③ 《魏书》卷96《僭晋司马叡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99页。

讖言中的“建元之末丘山倾”？^①“冰瞿然，久而叹曰：‘如有吉凶，岂改易所能救乎？’遂不复改。”^②建元二年（344年）九月，康帝崩。庾氏兄弟有意立长君，以晋元帝幼子司马昱继嗣，但何充（时任骠骑将军，“都督扬豫徐州之琅邪诸军事”，^③兼领扬州刺史）持康帝遗诏立时年两岁的太子司马聃为帝，即穆帝，并于次年改元“永和”。庾氏兄弟虽然嫉恨何充，但亦无可奈何，“庾翼叹曰：‘天道精微，乃当如是。长顺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④庾冰、庾翼先后于建元二年十一月、永和元年（345年）七月病逝。

（三）“大亨”与“二月了”

晋穆帝永和年间，琅琊王氏、颍川庾氏逐渐衰落，以桓温为代表的谯国桓氏崛起。自穆帝、哀帝、海西公、简文帝、孝武帝至安帝初年，桓氏在军政两界势力极盛。安帝隆安三年（399年），桓温庶子桓玄消灭政敌杨佺期和殷仲堪，控制荆州、江州等长江中上游地区。元兴元年（402年）初，掌控朝廷的会稽王司马道子及其子司马元显下令讨伐桓玄，桓玄则发兵东向。同年三月，桓玄攻入建康，自命为“总百揆，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领徐州刺史”，^⑤总摄朝政；分派桓氏子弟占据各州镇，铲除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的政治势力，赢得多数门阀士族的支持；废除“元兴”年号，恢复“隆安”年号。次年，桓玄令安帝改年号为“大亨”。大亨元年（403年）八月，桓玄自封为相国、楚王，加九锡。同年十二月，桓玄令安帝禅让，自立为皇帝，国号“楚”，初定年号为“建始”。右丞王悠之提醒桓玄，赵王伦僭逆，曾用此号，于是改为“永始”。然而，西汉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恰是王莽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之时，史臣评论说：“其兆号不祥，冥符僭逆如此。”^⑥两个月后，刘裕、刘毅、何无忌、魏咏之、檀凭之、诸葛长民等将领在各地起兵讨玄。对此，梁沈约在《宋书》中评论道：

① 参见《晋书》卷72《郭璞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10页。“倾”，《魏书》卷96《僭晋司马叡传》作“崩”（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00页）。《晋书》卷7《康帝纪》载：“或谓冰曰：‘郭璞讖云“立始之际丘山倾”，立者，建也；始者，元也；丘山，讳也。’”（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7页）文字稍有出入。康帝之讳“丘山”，采用的是拆字法，“岳”字上丘下山。

② 《魏书》卷96《僭晋司马叡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00页。

③ 《晋书》卷77《何充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29页。

④ 《晋书》卷72《郭璞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10页。

⑤ 《晋书》卷99《桓玄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90页。

⑥ 《晋书》卷99《桓玄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95页。

桓玄初改年为大亨，遐迩欢言曰：“二月了。”故义谋以仲春发也。玄篡立，又改年为建始，以与赵王伦同，又易为永始。永始，复是王莽受封之年也。始徙司马道子于安成，晋主逊位，出永安宫，封晋主为平固王，琅邪王德文为石阳公，并使住寻阳城。识者皆以为言不从之妖也。厥咎僭。^①

“亨”者，亨通、顺畅之意，《周易》所谓“元亨利贞”也。桓玄改元“大亨”，是为了祈求其政变顺利通达。在称帝后，他又接连改元“建始”“永始”，迹近儿戏，可能是听闻了有关“大亨”年号的负面解读。当时有别有用心者采用拆字法，将“大亨”理解为“二月了”——“亨”亦写作“亨”，上部“亠”形近“二”，中部酷似“月”，下部为“了”——这种“破译”俨如诅咒。永始元年（404年）二月，刘裕等起兵导致桓玄败亡，则是“二月了”讖言的“应验”。

（四）“天正”即“二人”与“一止”

萧纪，南朝梁武帝第八子，天监十三年（514年），封武陵郡王；大同三年（537年），以皇子身份出任益州刺史。史载“初，天监中，震太阳门，成字曰‘绍宗梁位唯武王’，解者以为武王者，武陵王也，于是朝野属意焉”，^②萧纪或因此而觊觎大位。

梁武帝太清元年，东魏叛将侯景率部投靠梁。太清二年八月，侯景起兵叛梁，勾结梁武帝侄子、都督京师诸军事萧正德，于同年十月攻入建康，又于次年三月攻陷台城。不久，梁武帝饿死在台城。诸皇子分封各地，掌诸州镇，竟无一人驰援建康，不仅坐视梁武帝饿死，而且在其父死后相互攻击、争夺大位。武陵郡王萧纪颇有武略，“都督益梁等十三州诸军事”，^③经营益州十七年，积蓄颇丰，在成都称帝，改元“天正”。^④“天”与“正”皆含义吉美，本是帝王年号的常用字。然而，侯景在废黜傀儡梁简文帝萧纲后，改立豫章王萧栋为帝，并改元“天正”，寻又命萧栋禅让，令此年号在当时蒙上了不祥的阴影。^⑤

① 《宋书》卷31《五行志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03页。《晋书》卷28《五行志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36~837页）所记略同。据《梁书》卷55《武陵王纪传》记载，梁武帝萧衍太清二年（548年），东魏降将侯景叛乱，次年破建康，梁武帝死于建康台城。梁武帝第八子武陵王萧纪在成都自立为帝。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丰侯萧赜讥嘲萧纪不能成事，即以“昔桓玄年号大亨，识者谓之‘二月了’，而玄之败实在仲春”为证（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26页）。《南史》卷53《梁武帝诸子·武陵王纪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29页）、《隋书》卷22《五行志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33页）所记略同。

② 《梁书》卷55《武陵王纪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26页。

③ 《梁书》卷55《武陵王纪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26页。

④ 参见《梁书》卷55《武陵王纪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26页。

⑤ 参见《梁书》卷56《侯景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57~859页。

时任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的永丰侯萧撝是梁武帝的侄子，被萧纪委以重任。不过，萧撝并不看好萧纪政权，对身边亲近的人说：“昔桓玄年号大亨，识者谓之‘二月了’，而玄之败实在仲春。今年曰天正，在文为‘一止’，其能久乎？”^①一年后，萧纪政权果然在萧绎兵马和西魏军队的夹击下败亡。《梁书》编撰者就此评论道：“初，纪将僭号，妖怪非一，其最异者，内寝栢殿柱绕节生花，其茎四十有六，霍靡可爱，状似荷花。识者曰：‘王敦仗花，非佳事也。’纪年号天正，与萧栋暗合，僉曰天字‘二人’也，正字‘一止’也。栋、纪僭号，各一年而灭。”^②

（五）“天保”与“一大人只十”

东魏武定八年（550年），傀儡皇帝静帝元善见禅位于齐王高洋，北齐正式建立，遂“改武定八年为天保元年。其百官进阶，男子赐爵，鰥寡六疾义夫节妇旌赏各有差”。^③渤海高氏历经权臣高欢、高澄的专擅朝政，为这一天已经经营十多年，在禅让过程中，各种祥瑞讖言层出不穷，以“天保”为开国年号必定是其深思熟虑的优选。然而，在士人中有“深识者”称，“天保之字，为一大人只十，帝其不过十乎”？^④此即将“天”拆解为“一大”，将“保”拆解为“人只十”。不仅如此，当时关于高洋在位不超过十年的预言还见于讖谣和道、佛讖语，例如：

又先是谣云：“马子入石室，三千六百日。”帝以午年生，故曰“马子”；三台，石季龙旧居，故曰“石室”；三千六百日，十年也。又帝曾问太山道士曰：“吾得几年为天子？”答曰：“得三十年。”道士出后，帝谓李后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也？吾其畏之，过此无虑。人生有死，何得致惜，但怜正道尚幼，人将夺之耳。”帝及期而崩，济南竟不终位，时以为知命。^⑤

又有江陵居士陆法和擅作讖语，史载“天保中，陆法和入国，书其屋壁曰：‘十年天子为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迭代坐。’时文宣帝享国十年而崩，废帝嗣立百余日，用替厥位，孝昭即位一年而崩。此其效也”。^⑥

（六）“隆化”离合为“降死”

北齐与北周东西对峙二十余年，争战不断。北齐后主高纬武平七年（576年）十二月，北周武帝宇文邕亲率步骑十四万余直击晋阳，北齐大败，

① 《梁书》卷55《武陵王纪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26页。

② 《梁书》卷55《武陵王纪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28页。

③ 《北齐书》卷4《文宣帝纪》，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50页。

④ 《北史》卷7《齐本纪中·显祖文宣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2页。

⑤ 《北史》卷7《齐本纪中·显祖文宣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2页。

⑥ 《隋书》卷22《五行志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38页。

后主高纬被围困在晋阳：“帝密遣王康德与中人齐绍等送皇太后、皇太子于北朔州。丙辰，帝幸城南军，劳将士，其夜欲遁，诸将不从。丁巳，大赦，改武平七年为隆化元年。”^①“隆”寓意王朝兴盛，“化”亦有更化之含义，而“时人离合其字曰‘降死’”，^②即抽取“隆”字右边“生”上一横，置于“化”字之上，形近“降死”二字。

高纬命堂兄安德王高延宗固守晋阳，自己逃回都城邺城，传位于太子高恒，自号太上皇。不久，北周大军先后攻破晋阳、邺城，高纬等北齐王公也陆续降周。北周建德六年（577年）十月，高纬、高恒与高延宗等数十人皆被赐死。^③

（七）“宣政”离合为“宇文亡日”

建德七年三月，北周武帝宇文邕改元“宣政”，西梁明帝萧岿“离合其字为‘宇文亡日’”。^④同年六月，宇文邕驾崩。

抽取“宣”字上下两横之间的“日”，以及“政”字左边的“正”，重新组合笔画，形近“宇文亡日”四字。

（八）“大象”离合为“天子冢”

北周宣帝宇文赟登基未及一年即传位于太子宇文阐，自称“天元皇帝”，所居称“天台”，并改大成元年（579年）为大象元年。^⑤西梁明帝萧岿再次离合“大象”为“天子冢”，^⑥其手法仍然是拆解笔画、重构文字。次年，宇文赟驾崩。静帝宇文阐在位仅三年，被迫禅位于辅政外戚杨坚，不久遇害。

（九）“广运”与“军走也”

弹丸之地西梁（亦称后梁）先后为西魏、北周藩属，上文提及“擅长”离合年号的萧岿，就是西梁的第二代皇帝。其太子萧琮即位后，定年号为“广运”，史载“江陵父老相谓曰：‘运之为字，军走也。吾君当为军所走乎？’其后琮朝京师而被拘留不反，其叔父岩掠居人以叛，梁国遂废”。^⑦

（十）“大业”离合为“大苦未”

隋仁寿四年（604年）七月，文帝杨坚驾崩，炀帝杨广即位，改元“大

① 《北齐书》卷8《后主纪》，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10页。

② 《隋书》卷22《五行志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34页。

③ 参见《资治通鉴》卷173《陈纪七》，陈宣帝太建九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381~5382页。

④ 《隋书》卷22《五行志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34页。

⑤ 《周书》卷7《宣帝纪》，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119页。

⑥ 《隋书》卷22《五行志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34页。

⑦ 《隋书》卷22《五行志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34页。

业”，史载“识者恶之，曰：‘于字离合为“大苦未”也。’寻而天下丧乱，率土遭荼炭之酷焉”。^①

杨东甫先生在《年号探微——兼与史苏苑先生商榷》中指出：

改元与否和使用什么年号，对一个王朝的盛衰和一个帝王的强弱，确乎不会产生什么实质性作用。然而，须知这只是我们今人的看法，作为当事者的古代帝王们可不这么看。有足够的史料可以证明，帝王们对年号是非常重视的。他们正是认为年号对国运的兴衰和他们个人的凶吉都有关系，所以才既十分重视年号的选择，更常用改元换年号的方式来予以调整。^②

东晋至隋的帝王们对年号的选择也不例外。然而，一些看似吉祥美好、振奋向上的年号，却被当时的“识者”或后世的史家视为加密的谶言，经“破译”方知隐含对当事帝王极为险恶的预言信息。

东晋至隋年号谶的教训，令自唐宋至清的统治者们印象深刻，在选择年号时常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唯恐一不小心就作茧自缚。例如，南宋洪迈《容斋续笔》卷13《纪年兆祥》云：

自汉武建元以来，千余年间，改元数百，其附会离合为之辞者，不可胜书，固亦有晓然而易见者。如晋元帝永昌，郭璞以为有二日之象，果至冬而亡。桓灵宝大亨，识者以为一人二月了，果以仲春败。萧栋、武陵王纪同岁窃位，皆为天正，以为二人一年而止，其后皆然。齐文宣天保，为一大人只十，果十年而终。然梁明帝萧岿亦用此，而尽二十三年。或又云：岿蕞尔一邦，故非讥祥所系。齐后主隆化，为降死，安德王延宗德昌，为得二日。周武帝宣政为宇文亡日；宣帝大象，为天子冢。萧琮、晋出帝广运，为军走。隋炀帝大业，为大苦末。唐僖宗广明，为唐去丑口而著黄家日月，以兆巢贼之祸。钦宗靖康为立十二月康，果在位满岁，而高宗由康邸建中兴之业。熙宁之末，将改元，近臣撰三名以进，曰平成、曰美成、曰丰亨。神宗曰：“成字负戈，美成者，犬羊负戈，亨字为子不成，不若去亨而加元。”遂为元丰。若隆兴则取建隆、绍兴各一字，与唐贞元取贞观、开元之义同。已而嫌与颜亮正隆相近，故二年即改乾道。及甲午改纯熙，既已布告天下，予时守贛，贺表云：“天永命而开中兴，方茂卜年之统；时纯熙而用大介，载新纪号

① 《隋书》卷22《五行志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34页。

② 杨东甫：《年号探微——兼与史苏苑先生商榷》，《广西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第85页。

之文。”迨诏至，乃为淳熙，盖以出处有“告成大武”之语，故不欲用。^①

明张燧《千百年眼》卷12《古今改元之误》指出，在选择年号用字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极多：

国家以改元为重，然历世无穷，美名有限，遂有前后相复之嫌。最可鄙者晋惠，六同汉号，一用吴号。汉哀之太初，晋元之建武，魏孝武之永兴，唐肃宗之上元，皆自同一代之号。乾德，蜀号也，因官人鉴背而始知；隆兴，伪号也，因曾布《日录》而后见。然其所当避者，又不止重复一节而已也。不可像溢法，如康定、靖康之类是也。又不可犯古陵名，如熙宁、崇宁，皆同刘宋陵名是也。又不可袭夷狄官名，如宣和乃契丹官门之名。徽、钦至彼，入门见额而始悔是也。是以当国改元者，最宜博洽之士。若永乐，乃前凉张重华、宋方腊及南唐贼张遇贤所僭年号，而正德亦西夏僭国年号，隆庆系金虏官名。当时廷臣无一人记忆，何也？宋太祖谓宰相须用读书人，岂虚哉！又当详稽国运，如宋改治平，而说者谓火德不宜用水。则我朝土德，不宜用木，犯之者有耗损元气之嫌。又当审察国姓，如周高祖姓宇文，改元宣政，当时以为“宇文亡日”是也。亦当避忌国号，如唐僖宗改元广明，而当时以为“唐去其口，而著黄家日月”，后果为黄巢所篡是也。大率离合之讖，深微而难逃，最宜熟察……宋徽宗改宣和，谓“一家有二日”，果徽、钦同为帝。钦宗靖康，谓“立十二月”，果周岁而止。又“正”为“一止”，前代如魏邵陵公之正始，金虏亮之正隆，梁临贺王之正平，魏高贵乡公之正元，渤海王嵩邻之正历，雷进之正法，皆非吉征。本朝正统，有北狩之变；正德，盗贼满天下，亦失考之故也。他若炎兴，应司马氏之名；升平，有不满斗之谣；大足，若数足，而则天改之。“昌”字乃“二日”，而李泌议之……虽国家隆替，有数存乎其间，而建元议号，则不可不详审也。^②

清赵翼也提醒当政者“年号用字，固取吉祥，然又有当慎择者”，“凡此（引按：年号讖）虽皆偶然适中，未必因此遂致不祥，然亦不可不加意也”。^③因此，非腹笥极丰、对汉字极敏感者，不足以选出无懈可击的年号。

① 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80~381页。

② 张燧著，贺天新校点：《千百年眼》卷12《古今改元之误》，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223页。笔者对个别存在讹误的文字与标点进行了调整。

③ 赵翼著，栾保群、吕宗力校点：《陔余丛考》卷25《年号用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8页。

二、东晋至隋“破译”年号讖的“识者”群体

将帝王精挑细选的年号用字“破译”为不利于帝王的天启信息的人，以及将字形拆解重组甚至扭曲却还能自圆其说者，当属舞文弄墨的高手。因此，年号讖一般需要通过“识者”甚至“深识者”加以“破译”，才能为一般人理解。自东晋至隋，有几位“破译”年号讖的代表性人物值得关注。

其一，郭璞，字景纯，河东郡闻喜县（今山西省闻喜县）人，西晋建平太守郭瑗之子；历任宣城、丹阳参军，东晋元帝时期，升至著作佐郎，迁尚书郎，曾任王敦的记室参军。郭璞是东晋著名的文学家、训诂学家，也是道学术数大师。《晋书·郭璞传》载：“璞好经术，博学有高才，而讷于言论，词赋为中兴之冠。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算历。有郭公者，客居河东，精于卜筮，璞从之受业。公以《青囊中书》九卷与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攘灾转祸，通致无方，虽京房、管辂不能过也。”^①此人善作预言，曾预警“建元”“永昌”年号之险恶。

其二，萧撝，字智遐，南兰陵（今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梁武帝弟安成王秀之子，封永丰县侯；曾任梁轻车将军及巴西、梓潼二郡郡守。武陵郡王萧纪称帝，封撝为秦郡王，“以撝为尚书令、征西大将军、都督益梁秦潼安泸青戎宁华信渠万江新邑楚义十八州诸军事、益州刺史，守成都”。^②因战败，降西魏。史载萧撝“博观经史，雅好属文”，“善草隶，名亚于王褒。算数医方，咸亦留意。所著诗赋杂文数万言，颇行于世”，后任北周露门学文学博士。^③此人曾预言萧纪“天正”年号一年而止。

其三，萧岿，字仁远，南兰陵人，昭明太子萧统孙，西梁第二代皇帝。史载“岿俊辩，有才学，兼好内典”，“著《孝经》、《周易义记》及《大小乘幽微》十四卷，行于世”，深得周武帝的赏识和隋文帝的礼遇。隋文帝纳岿女为晋王杨广正妃，史载：“岿来朝，上（引按：隋文帝）甚敬焉，诏岿位在王公之上。”^④然而，萧岿竟离合北周武帝年号“宣政”为“宇文亡日”，离合北周宣帝年号“大象”为“天子冢”。

郭璞作为卜筮术数名家，精于文字训诂，“破译”年号讖或出于对“学理”的推衍。萧撝对萧纪的帝业本无信心，他对“天正”年号的解读是对

^① 《晋书》卷72《郭璞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99页。

^② 《周书》卷42《萧撝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751~752页。

^③ 参见《周书》卷42《萧撝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751~753页。

^④ 参见《隋书》卷79《外戚·萧岿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92~1793页。

时局的预判和内心忧虑的自然流露。萧岿身世辉煌，家学渊源深厚，颇受西魏、北周当局礼遇。然而，西梁立国三十年，虽说文物典制“亦依梁氏之旧”，^①但局处江陵一隅，奉魏、周正朔，实为附庸。西梁第一代皇帝萧詧抑郁而终，其子萧岿尽管身段优雅，深谙以小事大之道，但寄人篱下之痛、难以言说之隐，可以想见。他两次“破译”北周年号，咬牙切齿，迹近诅咒，恐怕皆是发自其心灵深处的呐喊。至于匿名“识者”“深识者”们对年号讖的“破译”，应该也反映出他们对相关帝王、时局、人心的预判和认知吧！

三、从年号讖现象看东晋至隋的政治文化

年号纪年始于西汉，而年号讖最早出现于东晋，这与不同时期的政治文化背景和社会氛围有关。详细的讨论，可参阅拙作《讖纬与两晋南朝的政治与社会》，在此略作叙述。讖纬在东汉曾占有经术及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对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拥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然自魏晋起，屡经当局严令禁绝，加上学术范式、思想风气的转移，讖纬逐渐远离了经术及意识形态的主流。吊诡的是，当讖纬不再据有官方地位时，历代政权也就失去了对讖纬文本的控制和指导能力，讖纬对政治与社会的影响因而更具有实时性和灵活性。东晋至隋连延不断的政局动荡、战火纷飞、民生不宁也加深了朝野人心的焦虑感、恐惧感，并由此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符合自己期待的政治预言的渴望。

东汉光武帝宣布图讖于天下，凡 81 篇，包括《河图》《洛书》45 篇，《七经纬》36 篇。至梁阮孝绪编《七录》，讖纬类文献已达 32 部、232 卷。^②据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录，现存纬书篇目达 176 种。^③绝大多数增衍的文本形成于东汉末至南北朝时期，如《孝经中黄讖》载曹魏代汉之讖。即使在原有的 81 篇中，也常可发现在东汉以后增益的内容，例如：《春秋汉含孳》《春秋佐助期》载录曹魏的符命；在《易纬稽览图》中，能找到高洋受命的讖言；^④在《尚书中候·仪明篇》《孝经钩命决》中，有暗含萧道成姓名的讖言。^⑤

① 《周书》卷 48《萧詧传》，中华书局 1971 年版，第 859 页。

② 参见《隋书》卷 32《经籍志一》，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940 页。

③ 参见〔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④ 参见徐兴无：《讖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中华书局 2003 年版，第 3~10 页。

⑤ 《南齐书》卷 18《祥瑞志》载：“《尚书中候·仪明篇》曰：‘仁人杰出，握表之象，曰角姓，合音之于。’苏侃云：‘萧，角姓也。又八音之器有箫管也。’”又载：“《孝经钩命决》：‘谁者起，视名将。’……将，太祖小讳也。”（中华书局 1972 年版，第 350 页）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东汉以后还出现了不少新结集的讖言，如《孔老讖》《老子河洛讖》《尹公讖》《刘向讖》《尧戒舜、禹》《孔子王明镜》《郭文金雄记》《王子年歌》《嵩高道士歌》等。^①从《宋书·符瑞志》《南齐书·祥瑞志》的叙述来看，这些新起讖言与传统讖纬一样，拥有代言天命的的能力，是改朝换代的“合法符码”，有很高的认受性。一些具有传奇色彩的讖言名家，如郭璞、王嘉、陶弘景、释宝志等，也随之声名鹊起。

讖言走向社会、走向民间的后果之一，便是强化了魏晋至隋社会各阶层对汉字神秘本质和预言能力的信仰及敏感心态。《晋书·元帝纪》载：“初，《玄石图》有‘牛继马后’，故宣帝深忌牛氏，遂为二榼，共一口，以贮酒焉，帝先饮佳者，而以毒酒鸩其将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②司马懿曾否因《玄石图》之语而鸩杀牛金，虽无从查考，但两晋皇室以“马”为国姓，对所有语涉“马”字的讖言或讖谣都非常敏感确系史有明文。在这样的心理氛围和历史语境中，推测司马懿曾郑重其事地看待《玄石图》讖言，倒也不算是异想天开，至少东晋南朝的史家视其事为史实。^③杨骏封临晋侯，也有“识者”议论，认为杨氏以晋武帝后父而封“临晋”乃不祥之兆。^④史家或以为八王之乱自此始。宋明帝“末年好鬼神，多忌讳，言语文书，有祸败凶丧及疑似之言应回避者，数百千品，有犯必加罪戮”，^⑤亦是一例。又南齐武帝萧赜在便殿用金柄刀子切瓜，王晏提醒他：“外间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齐武帝闻之，“衔怒良久”。^⑥金刀之讖，萧道成曾利用以代刘宋，即所谓“金刀利刃齐刈之”。^⑦萧赜为何不悦于金刀之讖，暂难解释，但他对讖言之敏感及认真，由此可窥一斑。

① 参见《隋书》卷32《经籍志一》，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40页。

② 《晋书》卷6《元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7~158页。牛金曾为曹仁部将，从击周瑜，拜后将军，又屡随司马懿征蜀，击退马岱，是一员得力战将。牛金的事迹见于《三国志》卷9《魏书·曹仁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5~276页）及《晋书》卷1《宣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9~10页）。

③ 王隐《晋书》、孙盛《晋阳秋》均载其事。《宋书》卷27《符瑞志上》所载更详：“先是，宣帝有宠将牛金，屡有功，宣帝作两口榼，一口盛毒酒，一口盛善酒，自饮善酒，毒酒与金，金饮之即毙。景帝曰：‘金名将，可大用，云何害之？’宣帝曰：‘汝忘石瑞，马后有牛乎？’元帝母夏侯妃与琅邪国小史姓牛私通，而生元帝。”（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83页）

④ 参见《晋书》卷40《杨骏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77页。

⑤ 《宋书》卷8《明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0页。

⑥ 参见《南齐书》卷48《袁彖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834页。

⑦ 《南齐书》卷28《崔祖思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517页。

汉字体系庞杂、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中国古代社会，识文断字的门槛甚高，故对汉字神秘本质和预言能力的信仰，以及对精通汉字人士的崇拜也就更加深入人心。这种信仰乃至敏感心态催生了大量谜语讖、名号讖、年号讖、诗讖、讖谣等，^①令汉字的符号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通过拆字、隐喻、联想等加密形式，将暗示新天子姓名的预言信息植入讖言，在改朝换代之际极受欢迎。针对特定人物或事件，将预言信息植入讖语，属于有心为之。造讖之人固然可以自承受到天启，或灵机一动，测破“天机”，代天立言，但既有人为之迹，就难免作伪之嫌，如非依托孔子、刘向、郭璞、宝志、王嘉等名人，其可信度势必遭到质疑，流传度亦将大打折扣。因此，自东晋至隋，人们更重视纯粹出于偶然的随机讖言，认为那才真正是“天意”的泄露。最流行、最易赢得广泛认可的讖言多属无心插柳、妙语天成，往往出自事主自己选择的人名、地名、殿名、年号等。古人普遍相信汉字蕴含神秘的力量，认为其中暗藏玄机，因此在选择名号时总是保持真诚的敬畏之情，竭尽所能地选择吉祥的字眼。然而，“天威”难测，一些预示灾难的信息被“证明”恰巧隐藏在吉祥字眼的背后。

实际上，中国古代史籍所载讖言有不少是后人伪造的“马后炮”，也有不少“破译”讖言的“识者”其实是“事后诸葛亮”，即依据后来的事态发展，利用巧妙的文字游戏，将事前相关或不甚相关的语词曲解为高度准确的预言。此类人为操弄的痕迹与荒诞无稽的迷信，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史上并不鲜见。当然，也有个别或因“偶合”而灵验的真讖言，如西汉昭帝时的“公孙病已立”。^②

同时，讖言多是隐语式的，其语义时常模棱两可甚至包含进行多重解读的可能。当时或后世的“识者”对特定历史语境中时局发展的判断与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讖言的预测能力。一则讖言如果能够较好地迎合主流社会，特别是拥有历史诠释能力的群体的心态和期望，就往往能赢得较广泛的认可，展现出较大的政治文化影响力。东晋至隋的年号讖，即其一例。

(责任编辑：张梦晗)

^① 在汉代的讖纬中，已有谜语、拆字等暗喻式讖言，但数量不多。又，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流行的讖谣数量庞大，极有特色，笔者拟另作专文探讨。

^② 《汉书》卷27中之下《五行志中之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12页。